
January 2016

An Exploration into the Logics of Language Construction during the May Fourth Period

Wei De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Deng, Wei. 2016. "An Exploration into the Logics of Language Construction during the May Fourth Period."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6, (1): pp.35-44.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6/iss1/3>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试析五四时期语言文字建构的若干逻辑

——以国语运动、白话文运动、方言文学语言为中心

邓 伟

摘要:黎锦熙在《国语运动史纲》中有关五四语言文字建构的叙述,是以国语运动为主体的,关注的对象是语音,并将五四时期现代白话文运动局部性地加入对国语运动的历史描绘之中。胡适高度重视书写问题,以白话“文学”参与国语的建设,即是通过“国语的文学”途径达到创造“文学的国语”的最终目的。胡适表明了五四时期语言文字建构的整体逻辑,即以现代白话书写语言创造出现代民族国家共同语。五四中人对于方言、方言文学的见解,体现的是国语和国语文学寻求外在资源的问题。五四时期的语言文字建构逻辑确立了中国现代文学语言发展的基本道路,之后不同的历史阶段可能有局部的变化与话语言说方式的改变,但不可能出现整体性的颠覆,直至我们今天仍是如此。

关键词:国语运动; 现代白话文运动; 方言文学语言; 共同语; 逻辑

作者简介:邓伟,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文学博士。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文学语言现代转型研究(1898-1924)”[编号:10CZW048]阶段性成果。电子邮箱:dengwei257@126.com

Title: An Exploration into the Logics of Language Construction during the May Fourth Period

Abstract: In his *History of National Language Movement*, Li Jinxi discussed the process of language construction in the May 4th period with a focus on the pronunciation while putting the vernacular movement into his narrative of the national language movement history. On the other hand, Hu Shi paid high attention to written language and tried to construct the national language with “vernacular literature,” hoping to use “a literature of national language” to create “a national language of literature.” Hu Shi’s endeavor showed the general logic of language construction during the May Fourth period, that is, to construct a modern national language with a modern vernacular written language. The public opinion on dialects and dialectal literature during the May Fourth period reflected the issue of seeking external resources for constructing the national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national language. The logic of language construction during the May Fourth period lies behin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language, and ever since, there would be only minor and local changes without any revolutionary transformations.

Keywords: national language movement; modern vernacular movement; dialectal literature language; common language; logic

Author: Deng Wei is a professor in the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Email:dengwei257@126.com

前 言

1916年9月,由《青年杂志》刚改名为《新青年》的第2卷第1号的《通信》栏目之中,有信相询:“语言不通,阻教育之前进,谋教育之前进,必

先使语言一致。一致之语言何?即官话耶。故全国上下,竭力提倡官话,为谋教育前进之先导。然乃浅陋寡闻,不识有何官话书籍可为依本,兼之内地教育界友人,纷纷来函问官话书报”(沈慎乃5)。《新青年》记者回答的全文为:

示悉,国语统一为普通教育之第一著,惟兹事体大,必举全国人士留心斯道者,精心讨论,始克集事。此也当期诸政象大宁以后,今非其时。此时所谓官话,即北京话,仍属方言,未能得各地方语言之大凡,强人肄习,过于削足适履,采为国语,其事不便。愚见闻浅陋,于各种官话书报,素少探讨,愧无以对。惟于方言音韵之学,稍有研究。且居恒以为欲图国民知识之发展,宜改用罗马字母,创造新文,必如此始获收语言完全统一之效。国民教育,方易普及,当世议此者少。俟社会需要时,愚将论列一二也。(记者 5)

这是在五四现代白话文运动发动之前,《新青年》关于国语的集中看法,似也可视为《新青年》乃至五四时期语言文字建构的一个起点。它将国语与教育问题直接相连,既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大意义,态度又十分谨慎。这些看法基本不出晚清国语运动的逻辑,期待在中国政治清明之后自上而下推行国语,教育自然成为关键的方面,并未涉及白话文的问题,也谈不上有什么新的见解。对于什么是“国语”,《新青年》记者本身就是犹豫的:对官话的北京话作为国语的语音构成,《新青年》记者心存疑虑,倾向于“得各地方语言之大凡”的语音,即在1913年读音统一会由各地代表一人一票,选定的混合语音的“国语”,但对此似乎也没什么自信。在国语的书写符号方面,试图采用“新文”的罗马字母,这仍不是什么创见,因为在清末民初已经涌现了大量各种符号系统书写语音的方案,罗马字母亦是其中之一,要以此达到“语言统一”的国语运动目标,是无比的飘渺。并且,《新青年》记者倡导的罗马字母是否是一种文字,与汉字的关系如何,还是在1913年读音统一会上那样,“新字”只是一种注音字母,仅能为汉字注音——都是不清楚的。可以说,《新青年》记者是泛泛而谈,甚至不能回答沈慎乃来信之中对“官话书报”的具体请求,这也折射出当时国语运动的困境。如果我们要在《新青年》记者这一段话之中找到新意,可能正是在于某种模糊性,从“国民教育”“国语”这样深具现代民族国家宏大意义的词汇出发,一种同质的“国民”建构已成为中国

知识分子的自觉,这时已不大可能再采用晚清士大夫的国语运动方案——这一方案是在国语统一前提之下,认为士大夫还是使用汉字的文言,平民百姓可应用简单符号的“新字”,来继续维持既往的中国古代雅俗格局——《新青年》记者并未取得突破性的观点反倒是展现出某种超越清末民初中国语言文字建构的逻辑可能与广阔空间。

在这样的起点之下,我们瞩目于五四时期的国语运动、白话文运动和方言文学语言的现实情形以及它们的交织生长,瞩目于语音与文字在中国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多重逻辑关系的建立,实现途径是分析三个方面的具体内容,即黎锦熙的国语运动叙述、胡适的白话文运动的叙述和围绕《吴歌甲集》有关方言文学语言的争论,进而希望能较为完整展示五四时期中国语言文字建构的若干逻辑。

一

黎锦熙在《国语运动史纲》^①一书之中,将1912年至1923年命名为“注音字母与新文学联合运动时期”,即标明此时的国语运动已经与五四白话文运动产生某种融合生长。黎锦熙对这十余年间的国语运动进行了分期:“一、教育部读音统一会——国音之规定,注音字母之产生和传习。(民元至民五)二、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新文学运动,学校国文课程改革运动,儿童文学运动,汉字改革运动。(民五至民十二)三、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注音字母之公布,《国音字典》之公布,改学校国文科为国语科,审定中小学国语教科书及参考书,开办国语讲习所。(民八至民十二)”(黎锦熙 121)。黎锦熙的立场显然是以国语运动为主体的,关注的对象是语音,是国音的形成,为此扩散至相关的注音字母、国音字典、教科书等,同时再将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作为一个要素,局部性加入到对国语运动的历史描绘之中。在这一历史叙述之中,五四时期现代白话文运动并不具备自足性,甚至未能被独立地提及,或言黎锦熙的思路是文字从属于语音的,因而他的国语运动叙述在五四语言文字变革图景之中显得颇为独特。

黎锦熙的历史描绘在最大程度之上,彰显了国语运动在五四时期语言文字建构的意义,我们

将之作为认识五四时期国语运动逻辑的重要途径。以下,我们将按照黎锦熙的国语运动分期进行逐一的论述。

在第一个时期,黎锦熙描绘了民初教育部读音统一会的“国语”创制情形:

民国二年(1913年)二月十五日,正式开会,会员到者四十四人[……]第一步,照章审定国音:其审音办法,先依清李光地的《音韵阐微》各韵(合平上去,入声另列)之同音字,采用其较为常用者,名为“备审字类”,隔夜引发各会员,以便分省商定其应读之音,而用会中预备之“记音字母”注于其上,此“暂摄”之“记音字母”,即后来变为“真除”之“注音字母”也;次日开会,每省为一表决权,推一审音代表交出已注之单音,由记音员逐音共较其多寡,而以大多数为会中审定之读音——此多数票决之读音,即后来公布《国音字典》之蓝本也。(黎锦熙 123-24)

这一重要会议是晚清国语运动的合理延续,并不为民国的建立而终止,国语运动进一步在全国层面得以正式开展。另外,还有制定书写符号“第二步,照章要核定因素,采定字母,于是乎会场上又要打起架来[……]”(黎锦熙 124),书写国音的字母的提案就有偏旁派、符号派、罗马字母派,据说是“无非个个想做仓颉”,甚至要打起架来。在这里,我们发现“前言”提及的《新青年》第2卷第1号《通信》栏目中记者回答的知识渊源。换言之,此时的《新青年》的语言文学建构的逻辑为国语运动所支配,还可扩大说来,国语运动应是清末民初语言文字建构的主要思路。

在第二个时期,由于五四时期现代白话文运动带来书写问题的革命性突破,黎锦熙描绘的国语运动面貌的巨变,可以说已偏离了既有国语运动的轨迹,值得我们重点关注。在1916—1919年间,即是黎锦熙认为“国语运动的‘扩大运动’,是‘国语’与‘文学革命’之联合运动”(黎锦熙 133)。这里所谓的“扩大”,在于白话文的实质性介入,我们看到黎锦熙说起当时的国语运动中人在书写方面的情形:

自己做的这些文章,都还脱不了绅士的架子,总觉得“之乎者也”不能不用,而“的么哪呢”究竟不是我们用的,而是他们——高小以下的学生们和粗文字的平民用的,充其量也不过是我们对他们于必要时用的,而不是我们自己用的。不但是做文章,就是平常朋友间的通信,除开有时援引几句语录,模仿“讲学”的口吻外,也从来没有用过一句白话。(黎锦熙 134)

因此,这一时期国语运动的突破反而不是在语音方面了,而是应着眼于文字书写体系方面了。发生变化的转机在于胡适,由于在海外留学时期的胡适的介入,标志国语运动与白话文运动这两个独立的运动开始有合流的趋向。黎锦熙谈到:

我们的朋友间接到的第一封白话信,乃是这年年底胡适从美国寄来请加入本会为会员的一个明信片(这个明信片还保存着,算是本会会员来信中第一个用白话的)。[……]自从有了这一个明信片的暗示,我们才觉得提倡言文一致,非“以身作则”不可;于是在京会员中,五六十岁的老头儿和二三十岁的青年,才立志用功练习作白话文,以及近年来各种通俗演讲稿和白话文告之中,搜求好文章来作模范。所以这一年中会员人数虽没有增加多少,却很有蓬蓬勃勃的气象。(黎锦熙 134)

国语与白话文的结合可谓意义重大,晚清国语运动方案之中由文言与新的书写符号构成的中国古代雅俗等级格局被彻底打破,归于—统的白话文。当然,从来就没有一种成熟与同质的白话文可供直接采用,国语运动中人开始不断找寻写作的模范,但白话文成为国语公认的书写方式已无疑义。并且,黎锦熙似乎还想把五四白话文的发明权收在国语运动的名下,因为他看到一个事实:“这年陈仲甫主撰的《新青年》杂志,首先提倡‘文学革命’。第一篇是胡适底《文学改良刍议》(二卷五号),第二篇是陈仲甫底《文学革命论》(二卷六号),第三篇是刘复底《我之文学改良观》(三卷三

号)。但这三篇都是文言文,其他白话作品也还很少”,所以“这时的《新青年》虽极力提倡‘文学革命’,但讨论这问题本身的论文和通信等等,还没有放胆用‘以身作则’的白话文”(黎锦熙 134-35)。

在《国语运动史纲》有关五四白话文的历史叙述之中,黎锦熙不去讨论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与陈独秀《文学革命论》,而是重视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黎锦熙认为:

这篇文章发表之后,“文学革命”与“国语统一”遂呈双潮合一之观。北京的《晨报》和现在这种时行的小张周刊的创造者《每周评论》,都是这年十二月出版的。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组织与《新青年》互相应和的《新潮》,是次年一月出版的,白话文、注音字母、新式标点,都打扮着正式登场了。思想解放即从文字的解放而来;解放之后,新机固然大启,就是一切旧有的东西,都各自露其本来面目,所以现代史家把这年作为中国“文艺复兴”(Renaissance)时代底开场。(黎锦熙 136)

这相当于将“文学革命”与“国语统一”的合流作为一个历史的原点,引起日后一系列五四时期标志性文化事件。在黎锦熙的眼里,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在一起,白话文甚至只是“白话文、注音字母、新式标点”书写方面的序列之一,并无特别之处。由书写问题带来了历史的契机,共同成就了一番空前的语言文字变革的景象——“这两大潮流合二为一,于是轰腾澎湃之势愈不可遏”(黎锦熙 136)。

第三个时期为“国语统一筹备会”时期,黎锦熙的叙述又回到较为单一的国语运动,显现出国语运动与白话文运动在短暂合流之后的分离。黎锦熙以大量的篇幅描绘了“注音字母之公布”“《国音字典》之公布”“改学校国文科为国语科”,包含了“四声点法”“京国问题”“国音京调”等国语运动的具体语音问题。在这一时期,黎锦熙还提到1920年教育部训令“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文体,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一事。这一事件一向被认为是五四现代白话文确立

的一个社会标志性事件,其实是由颇具政府色彩的国语运动中人推动的:“教育部部务照例是分司主办的,那时普通教育司司长是张继煦,就是统一会的总干事;主管师范教育的第一科科长是张邦华,主管小学教育的第三科科长是钱家治,都是统一会的会员。修改法令是要经由参事室和秘书处,那时三参事汤中、蒋维乔、邓萃英和秘书陈任中,也都是统一会的会员”(黎锦熙 163)。

二

在对黎锦熙五四时期国语运动的历史叙述之中,我们侧重关注他在国语运动之中有关书写、有关白话文的看法。在考察胡适的现代白话文倡导时,与此思路类似,我们主要观察他在现代白话文运动之中有关国语的认识。因为,这样的“错位”视野更具张力,或许更能够看到有意思的地方。

在五四时期的现代白话文运动之中,胡适甚至重构了晚清以降国语运动的叙述图景,基本上都是批评性的,与黎锦熙的历史叙述完全不同。胡适后来认为:“我们当时抬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作战口号,做到了两件事:一是把当日那半死不活的国语运动救活了;一是把‘白话文学’正名为‘国语文学’,也减少了一般人对于‘俗语’‘俚语’的厌恶轻视的成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24)。在胡适的看法之中,并不会认可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与国语运动合流的描绘,更不是像黎锦熙那样,将白话文镶嵌于国语运动之中,而是明确地将白话文放在绝对优先的位置,放在拯救被认为已陷入困境的国语运动的位置。

那么,胡适所言的“国语”,意义何为?让我们回到胡适1918年所作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它明确为五四白话文运动引入了“国语”的概念,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重要口号。在国语问题上,胡适详细解释到:

有些人说:“若要用国语作文学,总须先有国语。如今没有标准的国语,如何能有国语的文学?”我说,这话似乎有理,其实不然。国语不是单靠几位言语学的专门家就能造得成的;也不是单靠几本国语教科书和几部国语字典,就能

造成的。若要造国语,先须造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自然有国语。这话初听了似乎不通。但是列位仔细想想便可明白了。天下的人谁肯从国语教科书和国语字典里面学习国语?所以国语教科书和国语字典,虽是很要紧,决不是造国语的利器。真正有功效有势力的国语教科书,便是国语的文学,便是国语的小说、诗文、戏本。国语的小说、诗文、戏本通行之日,便是中国国语成立之时。试问我们今日居然能拿起笔来作几篇白话文章,居然能写得出几百个白话的字,可是从什么白话教科书上学来的吗?可不是从《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书学来的吗?这些白话文学的势力,比什么字典教科书都还大几百倍。(《建设的文学革命论》293-94)

我们会发现,胡适并不是关注共同语音的问题,而是关注书写问题,即是从白话文的书写语言切入,以“文学”参与国语的建设,主要通过“国语的文学”途径达到最终解决“文学的国语”的目的,而与国语运动的语音思路迥异。我们不禁会问到黎锦熙重视胡适此文是否是为白话文运动取得的社会效果所打动,是否仅是为“国语”一词所迷惑?因为,胡适是将“国语”视为未完成的状态,不在于某种确定的语音,而在于文本化与书写体系的“国语的小说、诗文、戏本”。关于胡适在这里所言的“文学”含义,可直接用胡适的话来回答:“一切语言文字的作用在于达意表情,达意达得妙,表情表得好,便是文学”(《建设的文学革命论》292)。也可以参考傅斯年对“文学家”的看法:“文学家对于语言有主宰的力量,文学家能变化语言,文学家变化语言的办法,就是造前人所未造的句调,发前人所未发的词法。造的好了,大家不由的从他,就自然而然的把语言修正”(傅斯年183)。显然,这样的“文学”观念更多是从语言文字效果着眼的,有着明确的语言文字内涵。更为重要的是,胡适在这段文字说明了五四白话文的源泉——“可不是从《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书学来的吗”。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文言文是超越方言的存在,其实《水浒传》

《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等所使用的一般白话文何尝也不是超越方言的存在(当然也有不同程度方言存在的白话小说),因而这一书面语的白话文脱离了方言的限制,具有在单纯的语音民族主义之外,形成新的现代民族书写方式的资格与能力。

我们认为五四时期的现代白话文运动,不是从标准语音的国语方面考虑,而是继承了一种“前现代”的书写方式资源——以中国古代俗文学的小说、戏曲去取代雅文学的诗文,并冠以“活”与“死”截然对立的称谓,实则试图建立一种新的现代民族国家书写方式,并以此创造一种包含现代白话书写语言为内在特质的共同语。我们还读到胡适在日后对国语有这样的看法:“国语统一,谈何容易,我说,一万年也做不到的!无论交通便利了,政治发展了,教育也普及了,想偌大的中国,过了一万年,终是做不到国语统一的”(《国语运动与文学》422)。之所以胡适要冠以“国语”的称谓来重新命名白话文,以我们的理解,一方面可能是出于某种话语倡导方式的考虑,使得人们将白话文与鄙俗的既定观念脱离,另一方面胡适可能希望将现代白话文的倡导不仅理解为中国古代文学语言内部的颠覆性雅俗格局的调整,以“国语”赋予现代白话文更为强烈的现代民族国家色彩,赋予更为强烈的现代意味。其实,“国语”概念之中至关重要的语音问题,胡适是避而不谈的,这就造成中国语言文字现代建构在逻辑思路发生了重大的转移。大略而言,即是从晚清国语运动到五四白话文运动,从倡导“言文一致”“语言统一”到“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趋势转移——事实也证明了胡适的这一策略确是迸发出巨大的能量。当五四时期现代白话文运动一旦确立之后,我们也看到五四一代又对白话文进行现代的“改造”,不断灌输启蒙的内容和科学化、精确化与逻辑化书写方式的创制,即所谓“欧化白话文”方向的“雅化”发展,以至造成与传统白话文判然有别的面貌。

对于较为单纯的国语运动,胡适在不同时期一直重复着他的批评意见。例如,1921年8月胡适在安庆第一师范的讲演,在其日记之中还记下“国语文学运动”的概念,认为“国语文学运动”在于“以前皆以国语为他们小老百姓的,尚无人正式攻击古文,至此始明白宣言推翻古文”(《日记

1921·第四册》399-400)。在这里,胡适并没有使用“白话文”的说法,当然也没有文言与白话的对立,而是通过“以国语为文学”,去提升国语,打破晚清国语运动的雅俗格局设置,进而让国语与古文对立起来,显示了胡适对“国语”概念使用的灵活,以及“国语”概念内涵的极大扩张。再如,胡适1921年12月在北京教育部国语讲习所同乐会上的一次讲演,谈到“语言统一”时,有些不客气:“有了最有文学价值,文学兴趣的国语书报,人家才爱他读他。元朝,白话书本很多;明朝,白话告示也不少;何况现代,只推行几个字母,就算国语运动?真是做梦!”(《国语运动与文学》422)。胡适完全是重视文字的书报而轻视当时的国语运动,也说明其实现“语言统一”的具体途径,从根子上说胡适认为“语言统一”首先应是白话文书面语的统一。至于国语运动重要内容的字母创制,乃至黎锦熙将1912年至1923年命名为“注音字母与新文学联合运动时期”,胡适的看法可能会有所不同,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寄希望于字母创制,仍然是用全部热情呼唤“文学”。例如,胡适对国语讲习所同学的要求乃是:“文学这个东西,要有长时间的研究,不是几个星期所能弄得好的。诸位同学!我很希望诸位,各自养成文学的兴趣,具有文学的精神;最好,多做文学的作品,都成个文学家。要不然,至少也要能够赏识自然的美,文学的美,然后当国语教员,方得游刃有余”(《国语运动与文学》422)。

胡适这些语言文字建构的观点,影响巨大,很快就成为五四新文学方面的共识。沈雁冰说:“我们现在的新文学运动也带着一个国语文学运动的性质;西洋各国国语成立的历史,都是靠着一二位大文学家的著作做了根基,然后慢慢地修补写正,成了一国的国语文学。中国的国语运动此时为发始试验的时候,实在极需要文学来帮忙,我相信新文学运动最终的目的虽不在此,却是最初的成功一定是文学的国语,这是可以断言的”(沈雁冰146)。成仿吾谈到:“我们的新文学运动,自从爆发以来,即是一个国语的运动”,“我们要把我们的言语创造些新的丰富的表现!我们不可忘记了新文学的使命之一部分即存在这里!为要不辱这一部分的使命,我们今后要有意识地多多在表现上努力、要不轻事模仿!”(成

仿吾175-77)。沈雁冰与成仿吾是以新文学为出发点,看到新文学创作在中国现代语言文字建构中的先导性地位,而中国现代文学在相当程度上实践了胡适对于现代语言文字建构的逻辑——“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白话,就是将来中国的标准国语。造中国将来白话文学的人,就是制定标准国语的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294),形成了一条在没有推行实现标准语音“国语”的情形之下,极富现实意义的中国现代语言文字的发展道路。

让我们再扩大视野,参照在近代欧洲民族国家形成之中,所谓“语音中心主义”形成“语言民族主义”的问题。霍布斯鲍姆认为:“根据语言民族主义的古典模式,通常都是有一种族群方言被发展成全方位的标准化民族书写语言,然后这种民族语言又顺势变成官定语言”(霍布斯鲍姆189)。柄谷行人认为:“语音中心主义不能作为仅仅局限于西洋的问题来讨论”,“在日本,民族主义的萌芽主要表现于在汉字文化圈中把表音性的文字置于优越位置的运动中。但是,这并非日本特有的事情。在民族国家形成上,虽有时间先后的不同,然世界上无一例外地要发生这样的问题”(柄谷行人194-95)。那么,中国语言文字的现代转型呢,我们认为却是“无一例外”的例外。总体而言,中国语言文字的现代转型并不能描绘为那种单纯的语音中心主义,我们可以把国语运动与现代白话文运动理解为中国现代语言文字建构的两种基本思路,两种基本范式,实际上文字书写系统在中国现代语言文字建构之中起到关键作用,使得汉语、汉字也得到有效的承接,从而使得古与今的中国语言文字都属于同一民族文化的母体。不难发现,五四时期现代白话文运动的迅速成功与国语运动的旷日持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国语运动的成功需要强有力而稳定的政府和行之有效的教育部门等,但是这些条件在晚清以降的中国很长时期都不具备。现代白话文运动利用了长期形成的传统超越方言的一般白话书面语言,也利用了国语运动长期造成的变革氛围与人员组织,更多是在非政府层面的学院与民间奠基了中国现代一般书面书写体系与中国现代文学语言,成为五四时期语言文字建构的主要方面与基本逻辑。

三

我们还想探讨五四时期现代白话文倡导者对于方言的看法,方言作为国语运动与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对立面、或不大涉及的问题,在五四一代之中形成了新的思考逻辑,可由此返观五四时期语言文字建构的整体性逻辑。我们关注的是在顾颉刚所编的《吴歌甲集》^②一书之中,所载的胡适、沈兼士、俞平伯、钱玄同、刘半农所作的五篇序言和一篇顾颉刚的自序,前四篇序言较为集中反映出五四一代对于方言、方言文学的观点与理路。

胡适在序言中的看法,一方面是“国语的文学从方言的文学里出来,仍须要向方言的文学里去寻他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吴歌甲集·序一》9)。可以说,这样的方言存在,在语言文字的现实层面只能成为次级的存在。胡适很快专论国语文学与方言文学的关系:

若是从文学的广义着想,我们更不能不倚靠方言了。文学要能表现个性的差异;乞婆娼妇人人都说司马迁、班固的古文固是可笑;而张三、李四人人都说《红楼梦》《儒林外史》的白话也是很可笑的。古人早已见到这一层,所以鲁智深与李逵都打着不少的土话,《金瓶梅》里的重要人物更以土话见长。平话小说如《三侠五义》《小五义》都有意夹用土话。南方文学中自晚明以来昆曲与小说中常常用苏州土话,其中很有绝精彩的描写。(胡适,《吴歌甲集·序一》10)

就胡适而言,方言的意义的凸显,在于造就了文学语言丰富的差异性,从而体现出文学创作方面的个性与生气,方言文学语言的使用大概是为了某种修辞效果吧,更多的是讲究人物及其语言口吻的一致性与生动性。胡适还发出感慨:“假如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是用绍兴土话做的,那篇小说要增添多少生气呵!可惜近年来的作者都还不敢向这条大路上走,连苏州的文人如叶圣陶先生也只肯学欧化的白话而不肯用他本乡的方言”(《吴歌甲集·序一》10)。胡适的这一观点也类似于我们今天看到不少作家在文学语言使用面临

雷同化的困境时,而乞灵方言的做法。

沈兼士在其序言中的观点则为:“‘国语的文学’和‘文学的国语’,固然是我们大家热心要倡导的,但这个决不是单靠著少数新文学家做几首白话诗文可以奏凯,也不是国语统一会几句标准语就算成功的。我以为最需要的参考材料,就是由历史性和民族性而与文学和国语本身都有关系的歌谣。歌谣之中尤以江苏的为能,以优美之文辞,表现丰富之情绪”(《吴歌甲集·序二》14)。沈兼士同样着眼于现代白话文的资源问题,“文学的国语”不能仅由诸如白话诗文的新文学作品带来,民间歌谣被赋予历史性与民族性的现代意义,与文学、国语发生了必然联系,有了“参考材料”的资格,可以说与胡适的观点一脉相承。

俞平伯在其序言的观点似乎有所突破,将国语文学与方言文学置于同一位置:

我有一个信念,凡是真的文学,不但要使用活的话语来表现他,并应当采用真的活人的话语。所以我不但主张国语的文学,并且希望方言文学的产生。我赞成统一国语,但我却不因此赞成以国语统一文学。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如胶似漆的挽手而行,固不失为一个好理想;不过理想终久只是理想,不能因它的好而斗变为事实。方言文学的存在——无论过去,现在,将来——我们决不能闭眼否认的,即使有人真厌恶它。(《吴歌甲集·序三》16)

从“赞成统一国语”与“不赞成国语统一文学”的两个层面,产生某种方言文学应独立发展的看法,是因为俞平伯是将“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作为一个好的理想,而现实之中方言文学不能否定。俞平伯也意识到:“在我的意中,方言文学不但已有,当有,而且应当努力提倡它。这自然和国语热的先生们有点背道而驰的样子;然而我常常作此想”(《吴歌甲集·序三》16)。俞平伯还期待:“颉刚和我都是爱谈说《诗经》的。数千年之后,若再生一孔子,安见不把它著录于十五国风之外,另立一《吴风》呢?有厚望焉!”(《吴歌甲集·序三》18)。此时的俞平伯畅想中国古代的“采风”传统,大一统的既有国家视野使得方言文学最后

又需要进入主流文学之中。这不禁让我们怀疑俞平伯有关方言文学独立性的看法,或言俞平伯在其系列观点之中表现出矛盾之处。

钱玄同在序言之中,由俞平伯的观点谈到:“我是提倡国语文学的人了,似乎跟平伯现实要努力提倡方言文学‘有点背道而驰的样子’了。其实不然。平伯先生提倡方言文学,我完全同意;但他认为提倡方言文学跟提倡国语文学有点背道而驰,这话我却不同意”(《吴歌甲集·序四》25)。这是因为,“我的国语答案是这样,所以我承认方学跟言是组成国语的分子,它是帮国语的忙的,不是拦国语的路的。用古文八股的笔调来说:‘且夫方言之于国语,乃不相反而想成者也’。这就是我对于平伯先生认为提倡方言文提倡国语文学有点背道而驰这个见解不同意的缘故”(《吴歌甲集·序四》25)。钱玄同所确认的是国语与方言的主从关系,也是胡适一再所表明看法。钱玄同还更为明晰说:“在我的意中,方言文学不但已有,当有,而且应当努力提倡它;它不但不跟国语文学背道而驰,而且它是组成国语文学的重要原料。方言文学日见发达,国语文学便日见完美”(《吴歌甲集·序四》25)。在另一方面,钱玄同又话锋一转:“以上的话,都是站在国语方面说的。至于方言的本身,它是一种独立的语言;方言文学的本身,它是一种独立的文学:他们的价值,与国语跟国语文学同等。他们决不会因为有了国语文学而灭亡,它们也决不是因为国语需要他们做原料而保存。他们自己发达,他们永远存在”(《吴歌甲集·序四》25)。但是,钱玄同在其长篇的序言之中,并没有充分论述方言文学的独立价值的具体内涵,有的只是这么寥寥而突兀的几句。

五四中人对于方言、方言文学的见解,主要在于以方言、方言文学丰富国语、国语文学,很大程度上是沿着“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思路进行的。它并不是从语音方面切入的,而是从书面语体系的角度来考虑的,特别瞩目于方言所带来的文学语言的形象性与亲和性,所体现的是国语和国语文学建构有关外在资源寻求的问题。于此同时,也会有某种方言文学的倡导,这在逻辑上固然是成立的,中国现实层面也会有方言文学存在,但是五四一代并没有证明一种现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普遍口语方言的存在,并没有建设一种在方

言之中形成的书面语,也没有证明方言文学所具有的独立现代意义,并能将之纳入五四语言文字的宏大建构之中,显得是虎头蛇尾,不了了之。以至于,我们怀疑由五四时期歌谣运动等带来的一些方言文学的倡导,只是为了满足五四一代关于“民众”“民间”的文化想象,只是为了维护五四知识分子的某种知识话语与自我确认。于是,我们可以说这些方言文学倡导的想法只是五四文学语言建构中的一朵浪花而已,也没什么重要的实践成果并影响后世的,而基于语音的方言并不会对五四时期语言文字的整体建构提出挑战,即便是在五四时期方言文学的倡导之中,仍基本为国语运动与现代白话文运动的强大逻辑所支配。

结 语

从更为宽广的视野来说,我们认为在五四时期主要由现代白话文运动建立的中国现代语言文字逻辑具有相当的稳固性,它确立了中国语言文字的现代转型,规定了中国现代文学语言发展的语言文字基础。“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形成了一个宽泛,但也相当持久与有效的言说框架——即便是面对五四语言文字建构的激烈反对者。毋须讳言,我们指的是在1930年代左翼文艺思潮在语言文字方面新的逻辑的建立,例如瞿秋白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一文中的看法:

记得当初五四运动的时候,胡适之有两个口号,叫做“国语的文学和文学的国语”。现在检查一下十二年来文学革命的成绩,可以说这两个口号离着实现的程度还很远呢!现在的新文学,还谈不上是“国语”的文学,现在的“国语”,也还谈不上是文学的“国语”。现在没有国语的文学!而只有种种式式半人话半鬼话的文学,——既不是人话又不是鬼话的文学。亦没有文学的国语!而只有种种式式文言白话混合的不成话的文腔。(瞿秋白 137-38)

瞿秋白的批评不可谓不尖锐,但依然遵循“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标准,只不过对语言文字的实践情形有着极大的不满。瞿秋白还认为:

“现代的普通话,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剧烈变动而正在产生出来;文学的责任,就在于把这种新的言语,加以调节,而组织成功适合于一般社会的新生活的文腔。这样,方才能够有所谓的‘文学的国语’;亦只有这样办法,才能建立和产生所谓‘国语的文学’”(瞿秋白 138)。这里仍然是胡适以“国语的文学”造成“文学的国语”的逻辑思路与奋斗目标,“文学”仍然是执行语言文字的功能,只是充满左翼式的社会生活内容的介入。由此,我们是否能够这样说,五四时期的语言文字建构逻辑确立了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基本道路,而以后的发展(包括激烈的反对)也是在这一道路上行进,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可以在其内部有局部性的变化与话语言说方式的改变,但已不可能出现整体性的颠覆情形,直至我们今天仍是如此。

我们还想引用 1955 年 10 月 26 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中的一段话:

解放以来,政治经济的迅速发展推动着汉语的变化,也提高了语言的社会交际的效能。口语方面,能说普通话的人日见其多,普通话在语言方面要求接近北京语音的愿望也越来越强。书面语已经基本上统一于“白话”,达到了原则上的“言文一致”,而且会写会读的人越来越多,书面语在口语的继承上随时在提高自己的精密丰富的程度,同时也就口语的发展起着集中和提高的作用。(《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

历史进入另一新的时期,空前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有能力推广国语——普通话,这是国语运动长期以来一直孜孜以求的外部社会条件。此时,现代白话文的书面语宣告一统天下,再也不会留有文言的余晖了。我们发现在这一“社论”之中,并没有像五四时期那样特别强调“文学”在语言文字建构中的意义,从中反映出国语运动逻辑的地位上升。此时的政府可以通过法令、教育等进行有效的社会动员,进行现代民族共同语言的建设与推广,并加以明显的体制化,广泛开展起来,以达到国语运动既定目标的“言文一致”。但是,仍

然可以看到书面语对“口语的发展起着集中和提高的作用”的提法,五四时期语言文字建构的基本逻辑再次显现,反映出现代白话文运动的持续能量与基础地位。这些都表明中国语言文字现代转型的固有逻辑,国语运动与现代白话文运动两种范式的内在消长与有效延续,在其中仍是难以寻觅方言的位置,乃至踪迹的。

最终,让我们再一次回望晚清以降中国语言文字的现代建构,当穿过了无数的历史时期,在中国不断动荡而大起大落的社会语境之中,不难发现其超越了政权的更替,呈现出罕见的历史连续性。中国语言文字的现代建构于是成为整个中国社会文化现代转型之中意义重大的中心性事件,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我们最为基本的现代认同,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的同一性,也深刻影响了现代中国人对这个世界的根本认识。

注释[Notes]

① 黎锦熙的《国语运动史纲》一书,在 1931 年曾以《三十五年来之国语运动》付印,1934 年在修订补阙之后,以此名改版重印,是国语运动的经典文献。

② 可简介《吴歌甲集》一书的相关情况,1918 年顾颉刚在北大读书时,因丧妻而身心疲惫,只好休学回到故乡苏州养病,因受到北京大学刘半农等歌谣征集运动的影响,顾颉刚在这一期间收集到几百首苏州地区的民间歌谣,后来曾在《晨报副刊》和《歌谣周刊》上连载,1926 年由北大歌谣研究会出版了单行本。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成仿吾:“新文学之使命”,《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 年影印本。

[Cheng, Fangwu. “The Mission of the New Literature.” *Compendium of Chinese New Literature · Literary Debates*. Shanghai: Shanghai Literature Press, 2003 facsimile edition.]

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新潮》第 1 卷第 2 号,1919 年 2 月 1 日。

[Fu, Sinian. “How to Write in the Vernacular Language?” *New Tide*, Vol. 1. No. 2., 1 Feb. 1919.]

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

[Hobsbawm, Eric.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Trans. Li Jinmei.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0.]

胡适:“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

-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影印本。
- [Hu, Shi. "Introduction." *Compendium of Chinese New Literature ·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Shanghai: Shanghai Literature Press, 2003 facsimile edition.]
-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15日。
- [---. "On the Constructive Literary Revolution." *New Youth*, Vol. 4. No. 4. 15 Apr. 1918.]
- :“国语运动与文学”,《胡适全集》(第20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 [---. "National Language Movement and Literature." *The Complete Works of Hu Shi*. Vol. 20. Hefei: Anhui Education Press, 2003.]
- :“日记1921·第四册”,《胡适全集》(第29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 [---. *Diaries 1921 Vol. 4. The Complete Works of Hu Shi*. Vol. 29. Hefei: Anhui Education Press, 2003.]
- :“吴歌甲集·序一”,顾颉刚等《吴歌 吴歌小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
- [---. "Preface I to *The First Collection of Wu Songs*." Gu Jiegang et al. *Wu Songs and the History of Wu Songs*. Nanjing: Jiangsu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99.]
- 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
- [Karatani, Kojin. *Origins of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 Trans. Zhao Jinghua.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3.]
- 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
- [Li, Jinxi: *History of National Language Movement*.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1.]
- 钱玄同:“吴歌甲集·序四”,顾颉刚等《吴歌 吴歌小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
- [Qian, Xuantong. "Preface IV to *The First Collection of Wu Songs*." Gu Jiegang et al. *Wu Songs and the History of Wu Songs*. Nanjing: Jiangsu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99.]
- 瞿秋白:“鬼门关以外的战争”,《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
- [Qu, Qiubai. "The War Outside the Gate of Hell." *A Collection of Qu Qiubai's Works: Literary Works*. Vol. 3.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9.]
- 记者:“通信·答沈慎乃”,《新青年》第2卷第1号,1916年9月1日。
- [Reporter. "Correspondence: A Reply to Shen Shennai." *New Youth*, Vol. 2. No. 1. 1 Sep. 1916.]
- 沈兼士:“吴歌甲集·序二”,顾颉刚等《吴歌 吴歌小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
- [Shen, Jianshi. "Preface II to *The First Collection of Wu Songs*." Gu Jiegang et al. *Wu Songs and the History of Wu Songs*. Nanjing: Jiangsu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99.]
- 沈慎乃:“通信”,《新青年》第2卷第1号,1916年9月1日。
- [Shen, Shennai. "Correspondence." *New Youth*, Vol. 2. No. 1. 1 Sep. 1916.]
- :《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人民日报》,1955年10月26日。
- [---. *Working for Promoting the Reform of Chinese Characters, Promoting the Use of Mandarin and Realizing Chinese Standardization*, People's Daily, 26 Oct. 1955.]
- 沈雁冰:“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影印本。
- [Shen, Yanbing. "The Responsibility and Endeavor of New Literature Researchers." *Compendium of Chinese New Literature: Literary Debates*. Shanghai: Shanghai Literature Press, 2003 facsimile edition.]
- 俞平伯:“吴歌甲集·序三”,顾颉刚等《吴歌 吴歌小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
- [Yu, Pingbo. "Preface III to *The First Collection of Wu Songs*." Gu Jiegang et al. *Wu Songs and the History of Wu Songs*. Nanjing: Jiangsu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99.]

(责任编辑:王 峰)